



# 李盛铎藏书研究的历程与面向

□孙天琪\*

**摘要** 李盛铎木犀轩藏书在近代藏书史、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地位突出,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整体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善本数量,是中国藏书文化历史性变革时期的重要事件。近百年间,学界对这批藏书的研究与利用逐渐走向深入,相关成果集中于版本目录学和文献文化史两个领域,主要包括编制书目、整理题跋、影印珍籍、辩证版本、分析源流等多个方面。随着李盛铎档案、书札和近代其他藏书家日记、题跋不断被揭示,李盛铎木犀轩藏书研究迎来了新的机遇,仍然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可在撰写提要、整理信札、汇编传记、影印丛刊诸方面继续探索,力争系统总结版本目录学成绩,研讨近世藏书思想变迁,树立高校古籍收藏与研究范式。

**关键词** 李盛铎 北大图书馆 版本目录学 近代藏书文化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4.02.014

## 1 引言

中国藏书文化在晚清民国时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其内在转向理路与西方公共图书馆思想融汇,以开放、实用、流通为要义的新式公共藏书逐渐为士人团体接纳,“私藏售公”或“私藏捐公”成为一种潮流。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在 1905 年接受方氏碧琳琅馆藏书,是这一时期较早出现的标志性事件。20 世纪三四十年的时局变迁、家族没落,使得鬻售之风渐兴,典籍的流散速度远超前代。1940 年,在胡适、袁同礼、傅增湘、徐森玉、赵万里等人的促进下,李盛铎木犀轩藏书整体售归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大图书馆),极大地扩充了其馆藏善本资源,北大图书馆一跃成为当时国内高等院校图书馆中古籍藏量和品类最丰富之地。时至今日,古文献收藏已成为北大图书馆的一大特色,古籍藏量共计十余万种,一百五十万册,雄居全国高校图书馆之首<sup>[1]</sup>。北大图书馆收藏的宋元本中有三百零一种为李氏旧藏,稿抄本、名人校跋本中有近两千种为李氏旧藏,日本版古籍中的精粹几乎全部为李氏旧藏,书中海量的李盛铎批校、题跋提升了文物价值与学术价值。毋庸

置疑,李氏木犀轩藏书是中国高校馆藏古籍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宗,也是北大图书馆珍藏中的精华和底蕴所在,围绕李氏藏书的研究史是北大图书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期的李氏藏书已广受赞誉,傅增湘认为李氏藏书在“晚清四大藏书家”杨氏海源阁之上,“今李氏之书,较杨氏增加数十倍,且苞含鸿博,多属考览有用之书”<sup>[2]</sup>。李盛铎生前已将所藏敦煌遗书售予日本,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售予“中央研究院”。其身后售归北大图书馆的主要是历代刻本、稿抄本和日本版汉籍,是其收藏的主体部分,本文即讨论这一部分的研究情况。

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前,李氏藏书已有数次成体系著录,存留的多种书目成为了解自光绪以来积聚历史的最佳途径,亦可视作藏书研究之开端,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李氏藏书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后,馆方随即开展了细致的馆藏编目整理,于 1957 年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载录书籍 9087 种,58385 册,向达在引言中称“这批书籍是北京大学藏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专藏之一”<sup>[3]</sup>。20

\* 孙天琪,邮箱:suntianqi2020@163.com。



世纪 80 年代,张玉范整理《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揭示李盛铎题跋,介绍李氏藏书源流及特色,带动这批珍藏真正进入了研究时期。近年来李氏藏书中的经史宋元版书、稿抄本、日本版汉籍受到学人关注,北大图书馆渐次影印了其中一大批稀见珍本,为学界提供了便利。归纳来看,目前针对李盛铎藏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版本目录学、文献文化史两个领域,尤为偏重于珍本个案研究;但因为存世李盛铎档案、信札、批校等藏书相关资料尚待整理,影印或数字化影像远远不能满足研究需求,目前尚缺乏版本目录学和藏书史方面整体性的探究成果,未来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 2 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前的著录与利用

传统的私家藏书研究尤为注重对藏书目录和藏书题跋的发掘与考索,藉此探绎藏书源流、特色、思想。藏书家对个人珍藏进行著录、校勘、题跋的过程,往往涉及得书经过、善本分类、版本鉴定、校勘题识、价值品评,实则是其藏书研究的最原始起点。李盛铎家学渊源深厚,具备极高的版本目录学功底,尤为注重博取。个人近六万册藏书中品类宏富,既有珍稀罕睹秘籍,又有杂学百家之编,范围既广,蕴蓄遂因。李盛铎在古籍鉴藏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作题跋颇有黄丕烈、顾广圻风范。正因为李盛铎历时数十年热衷于亲自钤印、题跋、校勘,在书中积攒了丰富多样的信息,使得这批藏书有了更高的文化价值。晚清民国时期由李盛铎、袁克文、傅增湘、缪荃孙等藏书大家共同组成了京城书籍交往圈子,相互之间的借读、借校、题跋、版本探讨十分频繁,诸家书目、信札、日记中记载了对木犀轩藏书的利用情况,在研究李盛铎藏书流变及思想时不容忽视。

### 2.1 李氏藏书的来源与聚散

对李氏藏书的来源与聚散问题,学界已有清晰的认识。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讲述较为全面:道光时曾祖李恕在江西德化辟“木犀轩”藏书十万卷,皆毁于太平天国战争。李盛铎祖父李文湜、父亲李明墀亦喜藏书,北大馆藏中有“李明墀”“李氏玉陔”藏印者均为见证。李氏藏书真正初具规模是在光绪五年左右收得袁氏卧雪庐藏书之后。彼时李明墀任湖南巡抚,盛铎随宦居湘,经朱道然介绍得卧雪庐珍藏。从光绪初年到民国初年,李盛铎广搜曲阜

孔氏、意园盛氏、聊城杨氏数家典藏,又在岛田翰帮助下从日本购回大批国内久佚或不常见之古本,一跃成为近代藏书家之翘楚<sup>[4]</sup>。高洋《木犀轩藏书聚散考》在张玉范论说基础上总结了六大藏书来源,即“巧取卧雪珍本、两度日本访书、劫馀敦煌写卷、挽救内阁档案、刊印图籍、书肆访书”<sup>[5]</sup>。

总体来看,李盛铎购藏珍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早年随父亲李明墀居湘期间,二是戊戌后任驻日公使期间,三是民国初期。20 世纪 30 年代,退出政坛的李盛铎因经济困难数次售书,柳向春《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sup>[6]</sup>和栾伟平《李盛铎与周叔弢的藏书抵押关系小考——兼述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钤“周暹”印善本来源》<sup>[7]</sup>两篇文章已有介绍。李氏身后藏书由其第十子李滂管理,高田时雄《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详细介绍了李滂的生平经历<sup>[8]</sup>。李滂继承了乃父治学传统,所作《近世藏书家概略》品评三十余位藏书大家事迹,家藏善本信手拈来,递嬗演变叙述翔实。李氏藏书主体最终于 1940 年以四十万元价格售予北京大学,部分零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等处。

### 2.2 李氏藏书目录编制及其作用

李氏自光绪以来编制了数种藏书目录,这些目录虽大多是简记书名、卷数、版本的登记目录,但可追溯李氏藏书渐趋丰富的历史进程,是探讨其藏书源流的重要参照,这一点在前人研究过程中被忽略了。

李氏早期购藏之书,可通过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木犀轩书目》窥览。此目二册,分箱编号,著录书名册数,集部书籍为多。封面有李盛铎十子李滂题记:“先文和公侍先王父中丞公侨居邗江时,读书思过斋中,此目即斋中所蓄之书,泰半毁于癸巳之火矣<sup>[9]</sup>。”此目大约成于光绪十九年(1893)李盛铎任江南道监察御史之时。但常见之书居多,所收卧雪庐珍籍并未存于此。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谈及,“知木斋扬州寓庐火,藏书二百篋尽为祝融氏所收。中多明人集部世间不经见之本,亦江左文献之厄也”<sup>[10]</sup>。这份目录大概就是叶昌炽所记“二百篋”者。

今北大图书馆藏有各类目录十余种,多是李盛铎亲自编定。《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稿本一册,有李盛铎“丁亥年手书”题识,著录书籍 600 余种,成于 1887 年前后;《麀嘉馆行篋书目》稿本一册,封面李



盛铎题识“宣统壬子四月录于北京寓邸”，著录书籍600余种，成于1912年；《摩嘉馆续藏书目录》稿本一册，著录书籍200余种；《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四册，未署“甲子五月一日抄毕”，著录书籍2000余种，成于1924年前后；《木犀轩藏书目录》油印本残存三册，属于插架目录；《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油印本十二册，著录书籍一万余种；《木犀轩宋本书目》稿本一册，著录宋本108种；《木犀轩元本书目》稿本一册，著录元本94种；《木犀轩宋本书目》《木犀轩元本书目》铅印本合一册，著录宋本113种、元本102种；《李木斋氏鉴藏敦煌写本目录》稿本一册，著录敦煌写卷432件。

此外，国家图书馆藏民国抄本《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民国铅印本《木犀轩藏宋本书目》《木犀轩藏元本书目》；芷兰斋韦力先生有稿本《木犀轩收藏日本旧版书目》、写本《木犀轩藏书记》<sup>[11]</sup>；日本京都有抄本《木犀轩收藏旧本书目》。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待售期间，《学瓠》杂志于1936年第7期刊登了《德化李氏出售敦煌写本目录》，《民鸣月刊》于1937年第10期刊登了《德化李氏木犀轩善本书目》，傅增湘编成《德化李氏木犀轩藏书目录》稿本一册，李滂编有《木犀轩售书目录》稿本十二册。

不难发现，这些目录贯穿了李盛铎整个收藏生涯，不同书目之间的著录差异即为其藏书数量的变迁过程，编目过程中的类属调整、版本研判、零散札记等信息也是考察李盛铎版本目录治学经验的一种新颖途径。

### 2.3 晚清民国寓京文人的书籍交流

晚清民国时期的寓京文人存在着一个书籍交流群体，缪荃孙、江标、袁克文、叶昌炽、傅增湘、张元济等人的日记中对此有记载。其间借读、借校、借抄、题诗、作跋、代购、辑印之事不断，扩大了典籍文化传播范围，提高了典籍利用率，是研究近代藏书文化不可忽视的现象。

李盛铎因官位、资历较高，在这个群体中影响较大，袁克文、傅增湘、徐森玉皆为其弟子。例如，袁克文在1915至1916年间与李盛铎的书籍交往最为频繁，常借李盛铎藏书进行版本比对，李盛铎则为袁克文新收善本提供版本鉴定意见，或判定版刻年代，或鉴别藏印真伪，或略论版本价值，或分析源流更迭，或简述学人往事，或估算收购价格，或给出收藏建议。两人亦师亦友，书籍交往具有互补性，今国家图

书馆袁克文旧藏宋元本中多有李盛铎跋语，袁克文转呈之罕见本，李盛铎常留观录副。

从李盛铎与傅增湘、缪荃孙、袁克文、叶昌炽等人的往来函札中可以看出，李盛铎的版本鉴定是从实物出发，基于个人丰富的收藏品类和经眼阅历，重点从字体、纸张、版式、印次、装潢、翻刻等角度鉴赏，佐以历代书目著录，综合判定版刻年代、刊印地点、版本质量，显露出卓越的版本学功底。傅增湘对李盛铎执弟子礼，得以遍览李氏藏本，《藏园群书经眼录》中尽载李氏精善之书，在与张元济的书信往还中也时常提及。1937年傅增湘撰《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向公藏单位荐购，列举了宋元本、明刻本、旧抄本、名校本、日本高丽旧本中的精品，并称“李氏奋数十年之精力，成此大观，群推为文章之渊藪，学海之津梁”<sup>[12]</sup>。这些颇具影响力的藏书家的记录，从另一视角反映了李氏藏书的地位与价值，不仅可以从他们提到的一部又一部古籍中发现近代藏书聚散线索，还能为宏观总结李氏藏书特色与思想提供佐证，在今后的研究中值得引起重视。

### 3 版本目录学视域中的李氏藏书面貌

李氏藏书以版本精善、品类丰富著称，所以基于版本目录学视角的研究是主要方向。李氏藏书的具体数量和类别调查、李盛铎题跋搜集与整理以及具有典型特征的宋元本、日本版汉籍、稿抄本研究均取得了不少成果，展现了李氏藏书的生动面貌。

#### 3.1 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及编目过程

关于李氏藏书归入北大图书馆的经过，栾伟平《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一文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档案对相关史实梳理较为全面<sup>[13]</sup>。1942年下半年，李氏藏书拨交工作完成，随即进行了编目整理。栾伟平《木犀轩藏书的整理、编目与书目出版》<sup>[14]</sup>一文介绍了1942年至1957年之间的点收、编制流水号、编目工作，肯定了吴丰培、华忱之、张心沛的贡献；细致梳理了1946年至1949年，在赵万里具体指导下编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详情，介绍从事实际工作的有常芝英、宿白、冀淑英、赵西华四人，最终成书由常芝英在1957年完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直至今日仍是了解李氏旧藏最重要的目录书。1990年，北大图书馆古籍部最终清点李氏专藏计9303种，59691册，其中善本书5005种，32367册<sup>[15]</sup>。





### 3.2 李氏藏书题跋及书录整理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李氏藏书真正进入了研究时期。张玉范从北大馆藏李氏书中辑出李盛铎手书题跋173篇,附录国家图书馆袁克文旧藏本中的李盛铎手书题跋13篇,编为《木犀轩藏书题记》;同时整理李盛铎手稿《木犀轩藏书书录》(又称《李盛铎藏书书目提要》),将二者汇为《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198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印行。张玉范在整理前后撰写了《李盛铎及其藏书》《李盛铎与木犀轩藏书》<sup>[16]</sup>两篇文章,对李氏藏书源流和特点总结的十分到位。1998年北大图书馆编成《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其中选载的130种珍本书影大多数为李氏旧藏,并附有简要叙录<sup>[17]</sup>。2008年姚伯岳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偶录》,其中选取的嘉靖四年刻本《申鉴》、万历十九年刻本《河防一览》等珍本为李氏旧藏<sup>[18]</sup>。国家图书馆袁克文旧藏本中还有一批李盛铎题跋,《木犀轩藏书题记》中未予收载,孙天琪《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辑释》<sup>[19]</sup>进行了补充。

### 3.3 李氏藏书中的宋元本研究

宋元版书是典籍从写本时代过渡到刻印时代的最初形态,文本校勘质量总体较高,并且在书法、纸张、装帧上考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从明中叶开始渐兴收藏和鉴赏宋元本之风气,标志着古籍版本学走向成熟,如今的古籍版本学和藏书史研究依然注重对宋元本的揭示。傅增湘在《审阅德化李氏藏书说帖》中列举了《尚书孔传》《春秋胡传》等精湛完善的宋元本二十余种。向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引言中指出了李氏旧藏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礼疏》、南宋初期建阳刻本《史记》等宋元本的特点,并称“李氏书中属于纯版本性的古书甚多,在雕版史和书史中有特殊地位的也不少”<sup>[20]</sup>。《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李氏旧藏宋本《尚书》《周礼疏》《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后汉书》廿余种,均受到研究者重视。如张丽娟在研究宋代经书注疏刊刻时分析李盛铎藏本多属早期印本,特别是宋刊宋印八行本《周礼疏》在传世诸本中刷印时间最早<sup>[21]</sup>;元十行本《附释音尚书注疏》是难得的元刻元印本,保留了元十行本初始面貌等等<sup>[22]</sup>。这些藏本校勘价值巨大,杜泽逊、顾永新、乔秀岩等在相关研究中亦有涉及。

### 3.4 李氏藏书中的日本版汉籍研究

日本版汉籍是李盛铎收藏的一大特色,约占收藏总量的百分之十,因此北大图书馆也成为日本版汉籍在中国的收藏重镇。1948年编印《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录》之时,由宿白选取李氏藏书中的和刻本47种,并予以简短提要,后来摘编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sup>[23]</sup>。1995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书目》以及2014年影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均以李氏旧藏为主要收录对象。赵昱利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版古籍书目》统计李盛铎旧藏日本版古籍数量共计920种,其中子部医家、释家两类数量最多<sup>[24]</sup>。赵昱的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研究》整体介绍了李氏旧藏日本版汉籍的数量、种类、版本特征与优劣,选取《诗经》和《春秋》学若干个案例,“分析论述他们对于中国古代经学的继承以及与日本近世汉学的递嬗关系”,是目前这一领域最深入的作品<sup>[25]</sup>。

### 3.5 李氏藏书中的稿抄本研究

除宋元本、日本版汉籍之外,稿抄本也是李氏旧藏中的主要特色,其中一些精品个案的价值逐渐被揭示。如:《永乐大典·顺天府》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原本亡佚,幸得缪荃孙在光绪十二年至十四年间从嘉靖副本中抄出卷七至十四,后归李盛铎。张玉范撰文介绍了由来及史料价值<sup>[26]</sup>,徐莘芳据以点校整理<sup>[27]</sup>。王天然注意到李氏旧藏抄本《结一庐书目》著录内容丰富,可补刊本失收之目与讹误。而且李氏旧藏抄本正文之后附有跋文一则和附目一篇,对于讨论朱学勤藏书和版本目录学思想颇有帮助<sup>[28]</sup>。朱天助认为李盛铎过录宋兰挥旧藏抄本《直斋书录解題》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撰文阐述藏本特色并辑录了天头李氏校记<sup>[29]</sup>。蔡芷瑜发现李氏旧藏程乙本《红楼梦》部分版面与通行本有差异,通过校勘认为李氏旧藏本是程乙本系统中经过改进的后期刷印本<sup>[30]</sup>。李更关注到李盛铎题跋《类说》残抄本与通行明天启刻本在编卷、条目、文字、标目诸方面的差异,细致梳理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藉此对天启本的由来做了新的分析,并认为李跋本对釐清《类说》一书的版本递嬗关系十分重要<sup>[31]</sup>。张鸿鸣关注了李氏旧藏中的影抄本,通过钤印与递藏之迹判定李氏所藏汲古阁影宋抄《九僧诗》系伪作<sup>[32]</sup>,通过对校众本发现李氏所藏影抄本《相台岳氏刊正九



经三传沿革例》的源头是相台岳氏家塾刻本,并借以探讨了古书从影抄到影刻的流变过程<sup>[33]</sup>。这些学者着眼于个人治学兴趣,用专业的眼观探讨李氏旧藏的版本价值,从细微的视角充实了李氏藏书研究范围,为全面总结李氏藏书特色及思想提供了借鉴。

#### 4 文献文化史中的李盛铎及其形象

李盛铎是近代藏书史中的名家,《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文献家通考》《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中国私家藏书史》《近代藏书三十家》《沽上琅嬛:天津藏书楼和藏书家》《近代江西藏书三十家》等书中均有简要传记资料,介绍其藏书、刻书经历。有学者注意到了生平事迹中的抵牾之处,并予以辩驳。比如,李盛铎卒年有1934年、1935年、1937年等多种说法,王菡考证“李盛铎卒年必在癸酉年(1934)”<sup>[34]</sup>,而吴密通过讣告和天津《益世报》新闻报道明确了李盛铎卒于1937年2月4日,还发现了讣闻所附带的哀启中对其生平履历、病重情形的精当概述,纠正了前人沿用多年的错误观点<sup>[35]</sup>。李盛铎藏书为世人称赞,但其在晚清民初政局中的作为和影响却是毁誉纷纭,《春冰室野乘》等晚清笔记小说中记录了诸多野史异闻,将其描绘成“官迷”,以往的李盛铎藏书研究中也时有征引。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铎档案影印公布,李盛铎的形象得到了更多解读。尤其是其两次出使日本,借机回购大批宋元本和日本版汉籍,在中日文献文化交流中有突出贡献,最受学者表彰。

##### 4.1 李盛铎与中日文献交流史

李盛铎早年上海结识岸田吟香,是时岸田捆载东瀛旧籍舶沪售卖,十余年间李氏得旧刻古抄甚夥,也因此与日本版古籍结缘,逐渐累积成藏书中的一大特色。辛壬鼎革后,李盛铎奉袁世凯之命再度赴日考察经济,光绪、民国间两次日本之行对其藏书扩充至关重要。在日本期间,李盛铎与版本目录学家岛田翰相识,回购了一批宋元珍本,又载归大量日本古抄本、古刻本、古活字本。文廷式《东游日记》中有相关记载。高洋《李盛铎日本访书记》回顾了李盛铎访书始末与成果,并指出“不能忽视他在中日文献交流史上的重要作用”,同时强调清末民初赴日官员的访书活动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中有特殊意义<sup>[36]</sup>。王燕均《日本版古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介绍了北大藏日本版古籍的来源、地位与价值,“‘李氏藏书’中

的日本版古籍的收藏占据了北大图书馆现有日本版古籍馆藏的绝大部分。李氏藏书版本类型全,几乎涵盖了和刻本古籍发展史上各个主要阶段的代表性版本。如‘春日版’‘五山版’‘俞氏版’‘博多版’‘庆长、元和敕版’‘伏见版’‘骏河版’等”<sup>[37]</sup>。赵昱在撰写博士论文《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研究》过程中也引用了上述文章,并完善了很多细节。李盛铎还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日本学者有交往,高田时雄《明治四十三年(1910)京都文科大学清国派遣员北京访书始末》一文中的“与李盛铎的因缘”一节有所交代<sup>[38]</sup>。

##### 4.2 李盛铎与近世藏书家的交往

李盛铎论书尺牍存世数量约有二三百通,涉及晚清民国藏书家交往细节,记载了大量收藏故事,蕴含着丰富的藏书思想。曾庸《李木斋友朋信札》<sup>[39]</sup>整理了荣禄、张勋等致李盛铎信札二十一通,其中费念慈、叶昌炽、袁克文、缪荃孙、傅增湘、宝熙、董康、蔡元培的信札皆与购藏古籍有关。李小文、孙俊《李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sup>[40]</sup>释读国家图书馆藏札二十一通,集中于1915至1916年两人书籍交往最频繁的一段时期,涉及大量宋元本流布历史,李红英《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中多有引用。孙天琪《李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辑补》<sup>[41]</sup>补充李、袁两人往还尺牍,认为两人的书籍交往是晚清民国藏书史中的佳话。此外,孙天琪还发表了《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一通考释》<sup>[42]</sup>,释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铎档案和近年拍卖会所见李盛铎往来书札。栾伟平《李盛铎李滂父子致王文进信札选注》<sup>[43]</sup>释读北京师范大学藏《文禄堂藏各家手札》所载十七通,涉及晚年经济窘迫之时与书商的交往。《缪荃孙全集》《汪康年师友书札》《王懿荣书札辑释》等整理本中也收录了一些与李盛铎有关的信札。从这些零散的信札文献出发,串联藏书目录与题跋中的信息,可以丰富李盛铎藏书历程研究。

##### 4.3 士大夫李盛铎与其藏书之关联

作为士大夫的李盛铎深度参与了清末新政,这一时期也是其藏书数量迅速积聚的关键时期,相关话题是藏书背景及其生平经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盛铎有维新思想,戊戌前曾和梁启超在上海拟办《公论报》。他和康有为、梁启超同为保国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但李盛铎迫于荣禄、徐桐等顽固派势力中途退出,戊戌政变酝酿中为求自保转而上奏



参劾,加速了保国会解散。黄细嘉率先梳理了李盛铎与保国会的关系,在发起、召开、退会、劾会、入会动机方面均进行了说明<sup>[44]</sup>。马忠文利用李盛铎档案中的梁启超信札,补充了李、梁二人策划《公论报》、组织保国会的细节<sup>[45]</sup>。与康、梁决裂后,李盛铎赢得慈禧信任,迅速出任驻日本公使。清廷预备立宪之时,李盛铎被委任为出使比利时国大臣,并与载泽、戴鸿慈、端方、尚其亨组成五大臣政治考察团出洋考察各国政治,陈丹《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研究》<sup>[46]</sup>和潘崇《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sup>[47]</sup>是目前比较完善的研究成果。李盛铎在比利时支持王慕陶创办远东通信社,编译华报所载新闻,影响欧洲对华舆论导向<sup>[48]</sup>。马一《晚清榜眼公使李盛铎驻外事迹述论》阐述了出使日本、比利时期间的成绩,揭示了“盛铎持节期间勉力维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良苦用心”,认为“其在近代中国文化领域享有盛名,政治领域极具争议,外交领域则颇有可圈可点之处”<sup>[49]</sup>。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藏李盛铎档案看,李盛铎在内阁大库藏书散出后迅速获取了部分残本,驻日期间经常通过电报与盛宣怀等探讨时事与书籍收藏,身居高位为其搜罗善本提供了很多便捷条件,这些背景在研究其藏书经历时值得细考。

## 5 李氏藏书研究之不足与拓展领域

### 5.1 李氏藏书研究的不足之处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评价李盛铎为“吾国今日惟一大藏家”<sup>[50]</sup>,这一称号沿用至今,以至于李盛铎在今人眼中以藏书家闻名,远远盖过其在晚清民国政治史中的风云地位。在近代藏书史书写中,常熟瞿氏、聊城杨氏、归安陆氏、钱塘丁氏组成的“晚清四大藏书家”名号最响亮,均形成了研究专著。若从藏书总量、珍本品质、版本意识、利用程度、存藏状况多方面考量,李氏木犀轩应当与四者并肩。即使按照洪亮吉“藏书家五等之说”评判,李盛铎也应排在近代藏书家前列。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出版之后,有学者尝试品评李氏藏书地位,如熊学明、高平《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sup>[51]</sup>、沈焱《木犀轩李氏藏书特点考略》<sup>[52]</sup>、白化文《北大图书馆与李盛铎》<sup>[53]</sup>、冯方《浅谈李盛铎在收藏古籍中的功过是非》<sup>[54]</sup>、刘坤《“木犀轩”——李盛铎藏书始末》<sup>[55]</sup>、许丽雯《近代藏书家李盛铎与他的木犀轩》<sup>[56]</sup>、施亮《藏书家李盛

铎》<sup>[57]</sup>等,因为他们几乎未接触原书和第一手史料,皆未能超出张玉范《李盛铎及其藏书》一文的论说范围,常识性、重复性观点较多,学术价值有限。学位论文《木犀轩藏书聚散考》<sup>[5]</sup>《近代藏书家李盛铎研究》<sup>[58]</sup>也是基于张玉范观点的延展,整体粗疏简略,未能分析出独到的藏书思想。现有成果主要是版本目录学、文献文化史两个视角的个案研究,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还未能形成整体性的藏书研究专著,未能突显李氏木犀轩在近代藏书文化史中的独特地位。

版本目录学研究方面,现有成果解决了藏书源流、数量、类别、题跋整理等基本问题,形成了可信的书目文献,侧重对典型的宋元本、日本版汉籍、稿抄本展开了细致研究。或许是因为外界获取的影印或电子书影有限,结合原书及历代版本源流对李盛铎藏书题跋进行深入的解读依然不足,间接影响了对其版本目录学思想的全方位揭示。对宋元本、日本版汉籍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经部书籍,其余部类的书籍研究成果较少。李盛铎晚年专注批校所藏珍籍,撰写了《韶宋楼藏书志校注》《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校注》等著作,并在书中批注了大量文字,这些成果还未见学者关注。李氏热衷于收藏钱谦益、黄丕烈、顾广圻、戴震、翁方纲、王鸣盛、焦循等知名学者的稿本、校本,至今仍未形成专题讨论成果。李盛铎所藏佛教文献和科技文献数量庞大,其中稀见版本的价值与特色尚有待讨论。

文献文化史研究方面,现有成果关注了中日文献交流、藏书家交往、清末新政中的李盛铎及其形象。对比近世其他藏书大家研究进展,李盛铎的生平与交游、家族书籍收藏经历、作为士大夫的李盛铎与其藏书之关联等研究重复性观点较多,李氏收藏书籍的具体过程、往来函札中的书籍交流信息、李氏木犀轩出版书籍详情等有待发掘。比如,李明墀、李盛铎父子曾选取个人藏书进行刻印、石印。王昭勇调查了现存李明墀早年刻书,叙述了《木犀轩丛书》编刊经过,分析出李氏刻书注重乡贤文献及时贤经史著述<sup>[59]</sup>。光绪十三年,李盛铎在上海创办蜚英馆石印局,印行《皇清经解续编》《古经解汇函》等重要著作,在中国出版史上颇具标志性,但这段历史仅见范猛《晚清出版机构蜚英馆考略》<sup>[60]</sup>和杨丽莹《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提及,仍缺乏细致研究<sup>[61]</sup>。另外,李盛铎还撰写





了《奇门探索录》，修纂了《德化备志》，这些文献对于探讨其治学旨趣与学术思想颇有帮助。

## 5.2 李氏藏书研究的拓展领域

综合分析现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李盛铎藏书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未来一段时期内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继续努力。

首先，推进李氏藏书提要撰写与影印出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二书是目前外界了解李氏藏书面貌的主要途径。李盛铎生前编纂的《木犀轩藏书记录》（又称《李盛铎藏书记录提要》）共收书 1464 种，“大都为记述原书序跋、抄校流传原委、前人题记、收藏印记和卷帙编次、行格字数、版心题字、刻工姓名、讳字、牌记等”<sup>[62]</sup>。不仅著录数量不足总量的六分之一，而且与理想中的善本书志体例相差甚远。若能集中力量编纂一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的叙录体著作，发挥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用，全面揭示 9300 余种珍稀的卷帙信息、版本类型、行款格式、牌记铃印、批校题跋、递藏流变、书目著录、主要内容，可为李氏藏书研究走向精深奠定基础，亦可为新时代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树立标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日本版汉籍善本萃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珍本影印丛刊第一辑：汉书》以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了一批李氏旧藏，可以发现每当推出一批影印本，学界即能快速产出论题，带动了文史学者关注这批藏书。未来可分类、分阶段的继续推出影印本并建立数字化检索数据库。北大图书馆在这方面经验已非常丰富，2012 年斥资 1.1 亿元人民币从日本大仓文化财团大仓集古馆整体购回 931 种 28143 册古籍，迅速编纂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书志》《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大仓文库善本图录》，2020 年精选 131 种典籍、分六大系列影印出版《大仓文库粹编》228 册。此种模式可转移到李氏藏书上来，为研究者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加强藏书活动资料整理与研究。李氏木犀轩藏书活动资料有书目、题跋、批校、档案、年谱、信札、家谱等类型。书目和题跋已得到初步整理，其余类型亟待细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李盛铎档案已全数影印出版，包含奏折电稿、名刺拜帖、购书账簿、往来信札，体量庞大。这批档案是研究李盛铎与晚清民国政局关系的第一手资料，

也是未来编纂李盛铎年谱、传记的主要史料来源。其中与盛宣怀、江标、文廷式、沈曾植、费念慈、叶昌炽、王懿荣、徐乃昌、傅增湘、缪荃孙、袁克文、刘启瑞、刘承幹、陶睿宣的往来信札中涉及购藏、品鉴书籍之事，需要下功夫标点整理。国内拍卖会出现过《清十家致李盛铎书札》《李木斋函札册》两份信札汇编本，又时常出现与袁克文、傅增湘、缪荃孙等人的零散信件，均可广泛搜集整理。北大图书馆藏有稿本《廖嘉居士年谱》《李盛铎印谱》《李盛铎函稿》等，外界知者甚少，也可予以标点或影印。李氏旧藏中海量的批校文字更是少见揭示。李明墀编有《李氏家谱》四卷，存光绪十一年刻本，彼时盛铎尚幼，对追索家族历史仍有帮助。只有将这些副文本和边缘史料充分利用，才能发现更多的藏书活动细节，避免在常识性问题上反复堆砌。据悉，赵兵兵主持的“木犀轩藏书活动资料整理与研究”已列入 2023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相信未来几年内在这方面能有显著改善。

再次，重视藏书思想和历史功绩品评。王安功对近代藏书书写的视角创新有全面的认识，他认为：“我们如何就典籍在文化、社会和学术生活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进行大的历史提问，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现实和可能性问题<sup>[63]</sup>。”赵益<sup>[64]</sup>和程章灿<sup>[65]</sup>倡导结合传统文献学、中国书史和西方书籍史思路，开展专题性、断代性的书籍社会史、书籍经济史、书籍阅读史研究，这是李盛铎藏书研究应该持续努力的方向，争取形成一部整体性的研究专著、一部体例完善的年谱、一部精彩纷呈的传记。前文提到，目前对于李盛铎及其藏书的研究还停留在个案介绍层面，揭示深度与广度远远不能满足学界需求。如今知见的二百余则李盛铎题跋均已得到整理，再结合李氏藏书类别、批校文字、函札文稿，可进一步讨论其版本目录学成绩，分析其对毛晋、黄丕烈、顾广圻、焦循的推崇与继承，肯定其在近代藏书家中的历史地位。结合不同时期编纂的藏书目录与政治经历，可深入探讨李氏藏书的积聚历史与分类演变。针对李氏藏书中的宋元本、稿抄本、影抄本、批校本、佛教文献、和刻本，可突破个案研究范式束缚，开展细致的专题研究，在藏书特色方面寻求更生动的案例。李盛铎创办上海蜚英馆石印局经过及石印成果传播情况尚属学术荒地，李盛铎档案中存留的大量与蜚英馆往还函件是这一问题的突破口。



藏书文化作为近代社会变迁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传承史和时代变迁史,作为翘楚的李盛铎是研究这一问题的绝佳切入点。结合藏书家日记、信札,研讨晚清民国寓京文人群体的书籍交往,从文化转型视角分析近代藏书取向与学术嬗变,关注传统私家藏书的现代转型途径与思想变化,总结近代私家藏书的历史贡献和人文精神,既能提升藏书史研究层次,也能为高校古籍专题收藏与研究提供参考。

### 参考文献

- 朱强,王波,范凡,等.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现状与展望[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 30(6): 5-16.
-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95.
-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M].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7: 1.
- 张玉范. 李盛铎及其藏书[J]. 文献, 1980, 5(3): 242-248.
- 高洋. 木犀轩藏书聚散考[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0: 10.
- 柳向春. 木犀轩藏书两次夭折的售卖[M]//徐俊. 掌故: 第一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238-246.
- 栾伟平. 李盛铎与周叔弢的藏书抵押关系小考——兼述北京大学图书馆之钤“周暹”印善本来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 2013(4): 92-94.
- 高田时雄. 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2-9.
- 李盛铎. 木犀轩书目[M]//李万健, 邓咏秋.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 第一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2: 253.
- 叶昌炽. 缘督庐日记[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2163.
- 韦力. 木犀轩书目二种掌故谈[M]//沈乃文. 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七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451-455.
- 傅增湘. 藏园群书题记[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1096.
- 栾伟平. 木犀轩藏书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前前后后[J]. 中国文化, 2017 春季号: 97-103.
- 栾伟平. 木犀轩藏书的整理、编目与书目出版[M]//杜泽逊. 国学季刊: 第十七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20: 22-40.
- 张玉范, 王丽娟. 李氏专藏调查报告[R]//庄守经.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92: 422-424.
- 张玉范. 李盛铎与木犀轩藏书[J]. 中国典籍与文化, 1992(2): 33-37.
-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姚伯岳.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刻善本偶录[M]//姚伯岳. 燕北书城困学集.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228-234.
- 孙天琪. 国家图书馆藏李盛铎题跋辑释[J]. 图书馆研究, 2023, 53(5): 87-94.
- 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M]. 北京: 北京大学图书馆, 1957: 1.
- 张丽娟. 董康影印八行本《周禮疏》及其利用[M]//邓洪波. 中国四库学: 第五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79-89.
- 张丽娟. 元十行本注疏今存印本略说[J]. 岭南学报, 2023, 17(1): 223-224.
- 宿白.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朝鲜、日本善本书录[M]//宿白. 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 297-304.
- 赵昱. 北京大学图书馆李盛铎专藏中的和刻本述略——附李氏旧藏和刻本影宋本《尚书正义》小识[M]//杜泽逊. 国学季刊: 第十二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 65.
- 赵昱. 北京大学李盛铎旧藏之和刻本经部文献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17.
- 张玉范. 读缪荃孙抄校本《永乐大典·顺天府》[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4(4): 91-95.
- 徐萃芳. 永乐大典顺天府志残本[M].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 王天然. 读木犀轩旧藏抄本《结一庐书目》小识[J]. 文献, 2012(2): 83-87.
- 朱天助. 《直斋书录解題》宋兰挥藏本及校记[M]//沈乃文. 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六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93-122.
- 蔡芷瑜. 北大图书馆李盛铎旧藏《红楼梦》程乙本考——兼论其与青石山庄本及马廉残藏本之关系[J]. 红楼梦学刊, 2014(5): 272-293.
- 李更.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存李盛铎旧藏《类说》“七十卷本”残卷探析[M]//沈乃文. 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八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89-230.
- 张鸿鸣. 汲古阁影宋钞本《九僧诗》真伪考辨[M]//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 第二十三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162-174.
- 张鸿鸣.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影钞本《相台岳氏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发微[M]//邓洪波. 中国四库学: 第七辑.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161-172.
- 王茜. 藏书家李盛铎卒年辩证[J]. 文献, 2010(4): 191.
- 吴密. 讣闻所见李盛铎生卒年及其生平事迹[J]. 图书馆研究, 2016, 46(3): 125-128.
- 高洋. 李盛铎日本访书记[J]. 山东图书馆学刊, 2010(2): 66-70.
- 王燕均. 日本版古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M]//北京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院. 亚太研究论丛: 第十三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76.
- 高田时雄. 近代中国的学术与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8: 80-89.
- 曾庸. 李木斋友朋书札[M]//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 历史文献: 第七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180-186.
- 李小文, 孙俊. 李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J]. 文献, 2008(4): 83-100.
- 孙天琪. 李盛铎致袁克文论书尺牍辑补[M]//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文丛: 第21辑.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24: 192-201.
- 孙天琪. 傅增湘致李盛铎书札十一通考释[J]. 四川图书馆学报, 2024, 32(1): 1-10.





- 2023(1): 87-94.
- 43 栾伟平. 李盛铎李滂父子致王文进信札选注[M]//宫晓卫. 藏书家: 第17辑. 济南: 齐鲁书社, 2013: 74-78.
- 44 黄细嘉. 李盛铎与保国会关系考辨[J]. 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2(3): 84-88.
- 45 马忠文.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J]. 江汉论坛, 2009(10): 77-83.
- 46 陈丹. 清末考察政治五大臣出洋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2008.
- 47 潘崇.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48 周元. 清末远东通信社述略[J]. 近代史研究, 1997(1): 132-146.
- 49 马一. 晚清榜眼公使李盛铎驻外事迹述论[J]. 山西档案, 2015(2): 133-138.
- 50 伦明. 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M]. 雷梦水, 校补.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1.
- 51 熊学明, 高平. 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李盛铎[J]. 江西图书馆学刊, 1990(2): 64-66.
- 52 沈焱. 木犀轩李氏藏书特点考略[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94(2): 13-17.
- 53 白化文. 北大图书馆与李盛铎[J]. 出版史料, 2004, 10(2): 1.
- 54 冯方. 浅谈李盛铎在收藏古籍中的功过是非[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4(6): 96.
- 55 刘坤. “木犀轩”——李盛铎藏书始末[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4(4): 20-23.
- 56 许丽雯. 近代藏书家李盛铎与他的木犀轩[M]//天一阁博物馆. 天一阁文丛: 第13辑.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28-32.
- 57 施亮. 藏书家李盛铎(外一篇)[J]. 博览群书, 2007(9): 101-104.
- 58 胡林. 近代藏书家李盛铎研究[D]. 南昌: 江西师范大学, 2011.
- 59 王昭勇. 德化李氏木犀轩刻书考略[J]. 图书馆界, 2022(6): 42-46.
- 60 范猛. 晚清出版机构蜚英馆考略[J]. 文化学刊, 2016(7): 226-229.
- 61 杨雨莹. 清末民初的石印术与石印本研究——以上海地区为中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62 李盛铎.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M]. 张玉范, 整理.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5: 2.
- 63 王安功. 书归何处: 近代以来藏书文化与社会[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22: 4.
- 64 赵益. 从文献史、书籍史到文献文化史[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3, 50(3): 110-121.
- 65 程章灿. 书籍史研究的回望与前瞻[J]. 文献, 2020(4): 4-15.
-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 2023年12月25日  
修回日期: 2024年3月6日
- (责任编辑: 李晓东)

## The Process and Orientation of Li Shengduo's Book Collections Research

Sun Tianqi

**Abstract:** The collection of Li Shengduo's Muxixuan hold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book collection and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is collection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in the 1940s, greatly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rare books in the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It was an important event during the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book collection culture. In the past centur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gradually deepened its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of books, the relevant achievements are concentrated in two aspects: version cataloging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mainly including compiling bibliographies, organizing postscripts, photocopying rare books, dialectical versions, and analyzing the source and flow at multiple levels. With the continuous disclosure of Li Shengduo's archives, letters, and other modern book collectors' diaries and postscripts, research on Li's book collection has ushered in new opportunities and still has great room for expansion. In the future, we can continue to explore in writing summaries, organizing letters, compiling bibliographies, and photocopying series, striving to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 the achievements of version cataloging, discuss the changes in modern book collection ideas, and Establishing a paradigm for collecting and researching ancient books in universities.

**Keywords:** Li Shengduo;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 Bibliography; Modern Book Collections Culture